

格致集成

第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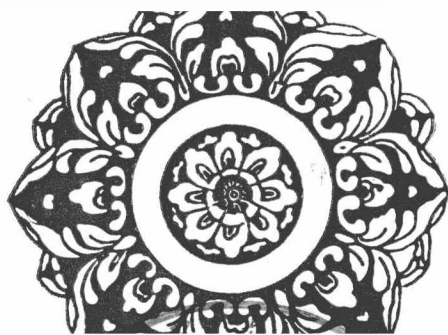
1207
26
:4

格萨尔学集成

第四卷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赵秉理 编



甘肃民族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02号

责任编辑：赵兰泉

王振华

封面设计：吴 楨

格萨尔学集成

(第四卷)

赵秉理 编

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静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61 插页7 字数1,549,000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21-0228-1/G·50

定价：¥150.00

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 学的科学体系而奋斗

——写在《格萨尔学集成》第四卷出版的时候

赵秉理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①小平的南巡谈话，党的十四大，全国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使神州大地春风得意马蹄疾，万枝红杏出墙来。

在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青海省财政厅、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甘肃人民出版社、甘肃民族出版社、全国与七省区《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以及各位专家学者的关怀与支持下，经过两年紧张编撰，《格萨尔学集成》第四卷终于在排比花枝满杏园，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潮中，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在把这本《格萨尔学集成》一、二、三卷的续集敬献给国内外朋友的时候，我首先要说的还是前三卷出版时多次说过的那几句老话：这套书是我国格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成绩首先归功于党和人民。成果是大家的！功劳是大家的！荣誉是大家的！我只是一块铺路石和一名“筑路工”，做了一点自己应做的工作。

借此机会，我想和大家共同探讨几个问题。

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是否初步形成？

这个问题是两年前提出来的。1991年4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甘肃人民出版社、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格萨尔学集成》首发式。会上印发的《〈格萨尔学集成〉简介》说：“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已初步形成。”有些领导同志在讲话中也指出：《格萨尔学集成》的出版发行，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已经初步形成。4月19日，主办单位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格萨尔学集成》出版座谈会。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表示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已初步形成”的结论，大有怀疑。认为中国的《格萨尔》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和完整的科学体系。也就是说中国的《格萨尔》学还没有形成，或者正在形成，或者准备形成。多数同志表示不同意这种观点，形成争论。

我认为“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已初步形成”的结论是实事求是的，正确的。

在科学研究领域，学科的学字，最初是从英文study翻译过来的。所谓学，就是研究的意思。红学，即《红楼梦》研究；敦煌学，即敦煌研究；格学，即《格萨尔》研究。因此，任何一门学问，只要有人开始研究它，这个学科就开始诞生了。红学不是形成于“五四”时期，也不是从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而是从18世纪下半叶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就开始了。他是我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红学家，从他开始评注《红楼梦》起，中国便有了红学。《格萨尔》学也是这样，从有人开始研究它那天起，就诞生了。这是一个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已是一

个常识性的问题,无须再争论,因为它已得到我国格学界的公认。正如丹珠昂奔先生在《〈格萨尔王传〉与藏族文化圈》一文中说的那样:“现在许多人在提‘格萨尔学’这个新词儿,我想格萨尔作为一门学科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会长,原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小组组长王平凡先生在《〈格萨尔〉工作成就巨大前景灿烂》一文中,不仅认为“我国《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已渐趋成熟”,而且还分析了它形成的具体条件。国外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就提出了《格萨尔》学这个术语,从未有人提出异议。

判断一门学科是否形成科学体系,不能靠一个人或几个人主观臆断,而是要用客观标准衡量。我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已初步形成的主要标志是:

第一,形成独立完整的《格萨(斯)尔》版本体系。早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就开始有组织地调查、搜集这部史诗的木刻本、手抄本。青海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走在全国前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展了声势浩大、深入持久的抢救《格萨(斯)尔》的调查、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等工作。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已搜集到藏文《格萨尔》木刻本、手抄本约300部,除去异文本,约100部;记录整理民间艺人说唱本200多部。已出版藏文《格萨尔》65部。我国还搜集到蒙文《格斯尔》木刻本、手抄本、影印本27部,已出版22部。还出版藏译汉、蒙译汉《格萨(斯)尔》37部。内蒙古《格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在编辑出版一套25种32卷本的《格斯尔》丛书,已有12种14本面世。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格萨(斯)尔》的总体结构,测算出它大约有150万诗行,2000万字,是世界六大史诗中最长的一部。^②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告:我国的《格萨(斯)尔》已经初步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从藏文《格萨尔》来说,已出版了几种不同版本的《天岭卜筮》、《英雄诞生》、《赛马称王》——《降伏妖魔》、《霍岭大战》、《姜岭大战》、《门岭大战》——《大食财国》、《卡切玉宗》、《朱孤兵器宗》、《雪山水晶国》——《地狱救妻》、《地狱救母》、《安定三界》等系列分部本。从蒙文《格斯尔》来说,也出版了几种不同版本的《北京木刻版格斯尔传》、《隆福寺格斯尔传》、《鄂尔多斯格斯尔传》、《乌素图召格斯尔传》、《诺木齐哈敦格斯尔传》、《咱雅格斯尔传》、《赡部洲雄狮王传》、《达木丁苏荣格斯尔传》、《布里亚特格斯尔传》、《琶杰格斯尔传》、《卫拉特格斯尔传》、《岭格斯尔传》、《格斯尔可汗传》、《阿拜格斯尔》、《英雄格斯尔》、《格斯尔的故事》等系列分章本。中国是《格萨(斯)尔》的故乡,是国际《格萨(斯)尔》学的研究中心。只有中国才能挖掘出如此丰富的《格萨(斯)尔》版本,为研究工作者提供最可靠、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奠定了最雄厚的基础。

第二,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研究队伍。《格萨(斯)尔》在中国大地上诞生后,立刻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清代以前,以绛曲坚赞、萨迦·索南坚赞、松巴·益西班觉尔、智贡巴·丹巴绕杰等为代表的古代学者,就在《朗氏家族史·灵犀宝卷》、《西藏王统记》、《关于格萨尔的答问》、《安多政教史》等著作中,对格萨尔这个人物进行了考证性研究,为后世建立《格萨尔》学起了启蒙作用。若从中华民国算起,我国已有五代学者研究过和正在研究《格萨(斯)尔》:第一代是任乃强、韩儒林、王光壁、谢国安、彭公候、李安宅、陈宗祥等。全国解放前,他们以成都华西大学为根据地,自发地调查、搜集、翻译《格萨尔》,成为中国现代、当代史上创建《格萨尔》学的先驱者和开路先锋。第二代是王沂暖、肖崇素、黄静涛、吴均、佟锦华、贾芝、王平凡、徐国琼、耿予方、段宝林、土登尼玛、更登、王歌行、左可国、杨质夫、华甲、齐木德道尔吉、白歌乐、安柯钦夫·琶杰等。他们当中的不少人,

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致力于《格萨(斯)尔》的调查、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立下汗马功劳。第三代是降边嘉措、王兴先、杨恩洪、阿旺、李学琴、黄文焕、潜明兹、唐本次多、单真、昂欠多杰、洛珠加措、齐木道吉、却日勒扎布、何天慧、谢佐等,他们下苦功夫,花大气力,从多方位、多层次研究《格萨(斯)尔》,发表了大量论著,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的基本理论框架与主要内涵。第四代是扎西达杰、丹珠昂奔、索代、诺尔德、角巴东主、巴雅尔图、斯钦孟和、乌力吉、格日勒扎布等,他们是40岁上下的中年学者,功底扎实,精力充沛,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格萨(斯)尔》,发表了许多非常有见地的论著,拓宽了中国《格萨(斯)尔》学科学体系的领域,填补了某些空白。第五代是吴伟、周炜、王哲一、张晓明、新巴雅尔、谢继胜等,他们是本世纪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专业素质好,思想敏锐,长于运用新方法研究问题,其《格萨(斯)尔》研究论著,既有创新,又有深度,是中国《格萨(斯)尔》学的一支生力军。除去古人,我国现在还有五代学者500多人在研究《格萨(斯)尔》。他们绝大多数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上自耄耋老专家,下自而立之年的学者,老中青梯队,人才济济,代代接力,后劲很足。这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的决定因素。

第三,研究成果累累。我国研究《格萨(斯)尔》,已有数百年了。仅从本世纪算起,也已60多年了,共发表论文等约1000篇;出版《格萨(斯)尔》研究专著13部、《格萨(斯)尔》研究论文集12部、国外《格萨(斯)尔》研究译文集3部,国外《格萨(斯)尔》研究专著译本2部;编印《格萨尔史诗》资料小辑10本、《〈格萨(斯)尔〉工作通讯》32期。清末以前,是我国《格萨尔》研究的启蒙时期。在中华民国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格萨尔》学经历了六个历史时期:

第一是发现时期(1929—1947):1929年,著名藏学家、民族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在西康藏区考察了一年,娶瞻对(今新龙县)上瞻总保夺吉郎加之女罗珠青措为妻,得知其妻姐寂墨卓玛精通藏文,会说唱《格萨尔王传》,遂请人记录,并与夫人共同翻译成汉文,定名“藏三国”。一年之后,任先生将其考察笔记整理成书,取名《西康诡异录》,分为4编180条,其118条标题为《藏三国》、119条为《藏三国举例》,均发表在1930年12月的《四川日报》副刊上。1932年,任先生又撰成《西康图经·民俗篇》,由南京《新亚细亚月刊》连载。1934年,新亚细亚学会又将此书出版为单行本。《藏三国》与《藏三国举例》被辑入此书,合并为一节,定名为《藏三国》。发现《格萨尔》之后,又继续调查搜集,并向学术界介绍了这部史诗。1944年,他在《边政公论》第4卷第4、5、6期上发表了《“藏三国”的初步介绍》。1945年,他在《康导日报》第6卷第9、10期上发表了《关于“藏三国”》。1947年,他在《康藏研究月刊》第12期上发表了《关于格萨尔到中国之事》。在任先生的影响与带动下,成都华西大学的一批学者也开始关注和研究《格萨尔》。1941年,韩儒林先生在《成都华西大杂志》第2期上发表了《罗马凯撒与关羽在西藏》。刘立千先生在解放前翻译了岭葱土司家藏藏文木刻本《天界篇》、《英雄诞生》、《赛马称王》。彭公候先生也将弗兰克的英文版《格萨尔王传》译成汉文。陈宗祥先生在李安宅先生的支持下,将法国大卫尼尔的《岭超人格萨尔王传》译成汉文,任乃强先生亲自审校和作序,并将之交给《唐导月刊》连续发表。以任乃强先生为首的四川前辈学者,为中国的《格萨(斯)尔》学树立了一座里程碑!

第二是第一个高峰时期(1956—1965):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国的文艺工作者和社会科

学工作者扬眉吐气，也使民族民间文学获得新生。许多学者自觉地把目光投向长篇英雄史诗《格萨（斯）尔》。1956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老舍先生在会上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对藏族《格萨尔王传》和蒙古族《格斯尔可汗传》进行了评介，号召文艺工作者对这两部史诗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1958年，随着全国收集民歌的群众采风运动的开展，也掀起了大规模调查搜集《格萨（斯）尔》的高潮。1959年2月，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决定在青海省文联成立《格萨尔》工作组。随后由省文联党组书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静涛和省文联主席程秀山组织领导了200多人参加的青海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团，足迹遍布青海、甘肃、四川、西藏、内蒙、北京等地的390个县、135个公社、588个生产队，搜集到各种木刻本、手抄本《格萨尔》150多部，除去异文本，实为34部，并翻译出74种内部铅印汉文资料本，约1700多万字，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与此同时，甘肃、内蒙古也进行了调查搜集《格萨（斯）尔》的工作。这是我国《格萨（斯）尔》工作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或黄金时代。在重点调查搜集木刻本、手抄本《格萨（斯）尔》分部本、分章本的基础上，也开展了研究工作，发表了42篇评介文章。徐国琼先生于1959年在《文学评论》第6期上发表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语言文学研究所于1962年，在《草原》第3期上发表的《蒙古族史诗〈格斯尔传〉简论》，黄静涛先生于1962年，在《省海湖》第5—6期上发表的《〈格萨尔〉序言》^②，代表了这一时期，我国《格萨（斯）尔》学达到的水平。

第三是灾难时期（1966—1978）：由于“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格萨尔》被打成大毒草，禁止搜集，禁止发行，禁止说唱，禁止研究，被查封、被焚烧、被批判。长期从事《格萨尔》工作的领导干部、研究人员和民间艺人受到残酷迫害。因此，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格萨尔》学成了一片空白，不但停止了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而且使已取得的成果遭到毁灭性损失，实在令人痛心！

第四是恢复发展时期（1978—1985）：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党自觉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于1978年11月为《格萨尔》彻底平反，推倒了强加给它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重新肯定《格萨尔》是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是极其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要求文化等部门重新做好它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了《格萨尔》的春天。1979年8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筹备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向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呈送了《关于抢救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报告》，接着从全国到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新疆成立了《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连续四次召开全国《格萨（斯）尔》工作会议。从而使停顿了13年的《格萨（斯）尔》工作重新生机勃勃地开展起来，并被列为“六五”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一个医治创伤，全面抢救的崭新局面。七年当中，共搜集到各种藏文手抄本、木刻本《格萨尔》200多部，除去异文本，约80部。搜集到蒙文《格斯尔》13部、民间口头传唱记录稿7部。录制藏族民间艺人说唱的《格萨尔》42部，约2600盒磁带；录制蒙古族民间艺人说唱的《格斯尔》356盒磁带。出版藏文《格萨尔》52部（含异文本、蒙文《格斯尔》10部、藏译汉《格萨尔》13部、蒙译汉《格斯尔》4部）。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史诗学术讨论会、七省区《格萨（斯）尔》艺人演唱会、全国首届《格萨（斯）尔》学术讨论会。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出版《格萨（斯）尔》研究论文集2部、《格萨（斯）尔》研究译文集3

部。不仅医治好“文革”对《格萨尔》学的创伤，弥补了损失，而且加快了发展步伐，跃上新的台阶。

第五是第二个高峰时期(1986—1995)：1986年5月22日—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格萨尔》工作总结，表彰及落实任务大会。认真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格萨尔》工作。表彰了14个先进集体、53位先进个人，表扬了12个单位和203名同志，给曾为《格萨(斯)尔》工作作出贡献的老专家、老艺人颁发了荣誉证书。制定了“七五”工作规划，安排部署了今后的《格萨尔》工作。这是《格萨尔》工作史上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庆功鼓劲、乘胜前进，意义极其深远的重要会议。会后，《格萨尔》工作被继续列为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进入第二个高峰时期，即第二个黄金时代。在继续完成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普查艺人、录音整理等任务的基础上，加强了学术研究，使《格萨尔》的学科建设又上新台阶。在这些年里，发表论文等620篇，出版《格萨(斯)尔》研究论文集和专著23部、《格萨(斯)尔》研究译著1部。这些论著开拓了《格萨尔》学的许多新领域，对这部藏、蒙民族大百科全书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战略、民族关系、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土民俗、民族心理、文学艺术、语言文字、音乐舞蹈、审美意识等等，进行了全方位研究。许多专家学者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做出了突出贡献，历史应当为他们记功。

老一辈著名藏学家王沂暖教授已是87岁高龄的格学泰斗。他不仅发表了许多有权威性的论著，而且带领助手们将藏文《格萨尔》的《贵德分章本》、《降伏妖魔之部》、《世界公桑之部》、《卡切玉宗之部》、《花岭诞生之部》、《分大食牛之部》、《安定三界之部》(两种译本)、《阎岭大战之部》、《木古驛宗之部》、《赛马七宝之部》、《香香药物宗之部》、《松岭大战之部》、《天岭九藏之部》、《雪山水晶宗之部》、《辛丹相争之部》、《甲察抢马之部》、《奇乳珊瑚宗之部》、《姜国王子之部》、《姜岭大战之部》、《霍岭大战之部》、《格萨尔王本事》等翻译成汉文，目前已经出版了14部，为国内外更多的读者、学者欣赏《格萨尔》，研究《格萨尔》，创造了条件。

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著名格学家降边嘉措研究员在1986年12月出版的32万言《〈格萨尔〉初探》，是我国《格萨尔》研究史上的第一部专著，填补了空白。1989年10月，他又出版了第二部18万言论著《〈格萨尔〉的历史命运》。他的第三部20余万言的专著《〈格藏尔〉与藏族文化》，也将与读者见面。

著名格学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徐国琼研究员为调查、搜集、整理、翻译、研究《格萨尔》奋斗了一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青海省文联已整理编印的《格萨尔》部本面临被抄绝焚尽的危难关头，他冒着生命危险，将57种71本木刻本、手抄本《格萨尔》星夜转移，藏于地下，幸免劫难。^③立下奇功，省府嘉奖。现在他虽已退休，仍老当益壮，穷且益坚，辛勤笔耕，奋斗不息，发表了数十万字论著。有的论文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等，在国外产生较大影响。1992年，他出版了十余万字的专著《〈格萨尔〉考察纪实》。他的另一部专著《〈格萨尔〉探微》，也将出版。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齐木道吉先生的蒙文《格斯尔》与藏文《格萨尔》异同辨析》、《蒙文《格斯尔》是蒙古族英雄史诗发展阶段的产物》等论文，具有较高水平，影响较大。

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兴先先生从事《格萨尔》翻译与研究十多年

来,多次深入藏区、土族、裕固族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发表了数篇研究流传在土族、裕固族地区的藏族《格萨尔》的论文,在国内外独树一帜,颇有影响,从而开辟了《格萨尔》学新领域。1991年10月,他出版了30余万字的专著《〈格萨尔〉论要》,资料翔实,论证深刻,反映了我国格学研究新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恩洪先生足迹遍布全国各个藏区,寻访艺人,实地考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格萨尔》说唱艺人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1990年10月,他出版了专著《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格萨尔〉》。

内蒙古大学蒙语系副教授却日勒扎布先生研究蒙古《格斯尔》,颇有功底。已发表《〈治理汉地固穆皇帝朝政之章〉考析》、《蒙古〈格斯尔传〉渊源管见》、《再论蒙古〈格斯尔〉的来源》、《蒙古〈格斯尔〉的独特性》等十几篇论文。1992年,他出版了专著《蒙古〈格斯尔〉研究》。选题新颖,见解独到,有理有据,论证科学,反映了蒙古族《格斯尔》研究的新成就。

蒙古族德·巴雅尔图是一位功底出众的中年学者。1989年10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蒙文专著《蒙古族第一部长篇神话小说——北京版〈格斯尔〉研究》。该书不仅首次提出北京版《格斯尔》是“蒙古族第一部长篇神话小说”的新命题,而且用四章篇幅进行了充分论证。这无疑是我国《格萨(斯)尔》学的一个新视角、新观点、新课题、新突破。

蒙古族乌·斯·乌力吉也是一位功底雄厚的中年学者。1991年9月,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蒙文专著《藏蒙〈格斯尔〉的关系》。该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蒙文《格斯尔》与藏文《格萨尔》的关系,颇有启迪。

在中年专家学者中,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文工团副团长、一级作曲、音乐家扎西达杰,也是一位佼佼者。长期以来,《格萨尔》说唱音乐是一个难以攻克、无人深入探讨的大课题。扎西达杰自觉地挑起了这副重担。经过几年潜心钻研,他发表了《玉树藏族〈格萨尔王传〉说唱音乐研究》、《〈格萨尔〉的音乐性——史诗文字对其音乐的表述之研究》等论文,填补了一项空白,开辟了中国《格萨尔》学的一个新领域,受到国内外学人的关注,赢得赞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年轻女学者吴伟,是格学界出类拔萃的后起之秀。在《格萨尔》人物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1992年6月,她出版了专著《〈格萨尔〉人物研究》,展示了中国《格萨尔》学的新水平、新突破、新拓展。中央民族学院的耿予方教授在评论中称赞该书是近十年来蓬勃兴起的《格萨尔》学研究中涌现出来的一项具有创见性和开拓性的新成果。

“它的引人注目和可贵之处,主要在于:不仅选择了一个人们颇感兴趣、众说纷纭的新课题,而且采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角度,从藏族的历史现实、社会发展、农牧生产,经济思想、精神世界、心理素质、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民族关系、部落战争、婚姻制度、目标追求、文学传统、审美标准、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等诸多因素出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合研究和相当深入的认真探索,提出了基本上可以信服的结论。对于进一步理解英雄史诗《格萨尔》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来龙去脉、源远流长和巨大影响,更深层次地认识《格萨尔》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有着填补空白、发人深思的作用。”^④《〈格萨尔〉人物研究》的问世,雄辩地证明:“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⑤我国年轻一代的格学家出手不凡,潜力很大,竞争力很强。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格学走向世界讲坛的希望!

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我们在第二个高峰时期里，还加强了内外学术交流。1989年11月1日至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四川省民委、四川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在成都市联合召开建国以来的首届《格萨（斯）尔》国际学术讨论会，苏联、德国、蒙古、日本、澳大利亚、巴基斯坦等国的12名专家与我国的60多名各族学者，欢聚一堂，共同探讨格学问题，宣读了40多篇论文。1991年8月7日至13日，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西藏社会科学院，在拉萨市联合召开第二届《格萨（斯）尔》国际学术讨论会。美国、德国、法国、保加利亚、奥地利、蒙古、日本、香港、台湾、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15名专家学者和我国的60多名格学研究者促膝交流学术研究成果，宣读了50篇论文。1993年7月下旬，内蒙古自治区《格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和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又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联合召开第三届国际《格斯（萨）尔》学术讨论会，宣读论文49篇。

第二个高峰时期还剩两年多时间，我国的《格萨尔》学学科建设必将持续腾飞，跃上更新的台阶。

展望未来，前程似锦。在进入第六个历史时期以后的漫长年代里，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将开始一步步地迈向成熟化、完善化、现代化、国际化。

第四，众多的说唱艺人。我国的《格萨（斯）尔》与世界上其他五大史诗（古代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希腊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修记》、印度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它是一部活着的史诗，至今仍被众多的民间艺人说唱着，创作着，丰富发展着。

藏语把以说唱《格萨尔》为生的民间艺人称为仲哇。其共同特点是：酷爱史诗，娴熟诸知，自编自演，口若悬河，激昂跌宕，神奇莫测。根据每个人的从艺发缘，说唱形式，表演风格等，仲哇又分为九种类型：一是“梦传神授”的巴仲艺人；二是所谓神灵附体、兴奋迷狂的颇（迫）仲艺人；三是看着铜镜、水碗、纸张说唱的札仲（圆光）艺人；四是书写抄本或描符画文的智仲艺人；五是传承师祖说唱之业的结仲艺人；六是挖掘伏藏史诗抄本说唱的德仲艺人；七是靠耳闻心记学会他人说唱本领的退仲艺人；八是背诵说唱的洛仲艺人；九是照本诵唱的丹仲艺人。

我国已发现藏族、蒙古族、土族等说唱《格萨（斯）尔》的民间艺人约200名，已录制说唱磁带5000多盒，若全部整理成文，约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历代艺人是《格萨（斯）尔》史诗的直接创造者、继承者和传播者，是最优秀、最受群众欢迎的人民诗人，天才的人民艺术家，堪称国宝。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精神。历史不会忘记这支才华出众的艺人队伍，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做出了特殊贡献。

已故藏族《格萨尔》杰出说唱家、西藏自治区边坝县的扎巴·阿旺嘉措（1904—1986），说唱了60多年《格萨尔》，被誉为东方荷马。他自报会说唱43部，逝世前，已由西藏大学《格萨尔》研究室录音整理出《天岭仙界》、《降生史》、《征服土地神》、《野兽敌宗》、《丹玛青稞宗》、《东斯门马宗》、《西宁弹药宗》、《米娘金子宗》、《征服魔王》、《霍岭大战》（上下）、《霍齐巴山羊宗》、《姜岭大战》、《门岭大战》、《大食财宗》、《索波马宗》、《奇乳珊瑚宗》、《雪山水晶宗》、《象雄珍珠宗》、《汉岭传奇》、《米娘药宗》、《阿塞铠甲宗》、《乌斯茶宗》、《东莫桂骡马宗》、《松岭大战》、《巴嘎拉神奇王》，共25部，500多盒磁带，500多小时，40多万诗行，400多万字。其中《天岭仙界》、

《门岭大战》、《松岭大战》已正式出版。

已故蒙古族《格斯尔》杰出说唱家、内蒙古扎鲁特旗的琶杰（1902—1962），自幼热爱说书艺术，生前留下80小时《格斯尔》说唱录音磁带，1960年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1988年，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琶杰格斯尔》。

藏族《格萨尔》说唱家、西藏丁青县的桑珠，年过花甲，一生以说唱《格萨尔》为生，会说唱18大宗和10部小宗，现已说唱了43部。

藏族《格萨尔》说唱家、西藏索县的青年女艺人玉梅，会说唱70部《格萨尔》，已说唱40多部。

蒙古族《格斯尔》说唱家、内蒙古巴林右旗68岁的桑布拉·敖日布，9岁起从师学艺，30岁开始说唱《格斯尔》，并自拉四弦琴伴奏。每次说唱都能充分进入角色，感情奔放，铿锵有力，威武雄壮，感人肺腑。1988年，他把自己说唱的内容录音整理成一部120章蒙古族《格斯尔》传，献给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珍藏，受到嘉奖。

青海省是《格萨尔》的故乡，也是《格萨尔》说唱艺人最多的地方，至少拥有藏族、蒙古族和土族艺人近百人，已为55名藏族艺人建立了说唱档案。其中有四大奇人：第一位是说不完的藏族《格萨尔》说唱家、格尔木市唐古拉乡59岁的才让旺堆。他自报会说唱146部《格萨尔》，已说唱6部，其中《阿达鹿宗》、《托岭大战》、《犀岭大战》、《南铁宝藏宗》是从未传世的绝章，《托岭大战》已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第二位是写不完的藏族《格萨尔》说唱家，甘德县26岁的格日坚参。他自报能写120部《格萨尔》，已写出4部，100多万字。其中《敦氏预言授记》已经正式出版。第三位是抄不完的藏族《格萨尔》说唱家，玉树藏族自治州群众艺术馆60岁的布特尕。他自幼随父搜集抄写《格萨尔》。曾用一年半时间，抄写出50万字的《托岭大战》，近年来又抄写出50万字的《阿达鹿宗》，还搜集到《蒙古马宗》、《征服朱古兵器国》等部。第四位是画不完的藏族《格萨尔》优秀说唱艺人，甘德县40多岁的尕日洛。他精通佛教绘画，并将其运用于《格萨尔》史诗，画出无数人物肖像，个个传神，栩栩如生，独占鳌头，堪称一绝。他还经常当众用画，现场展出，令人赞口不绝。

为了铭记艺人的历史功绩，提高其社会地位，扩大其社会影响，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于1991年11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全国《格萨（斯）尔》说唱艺人命名大会，授于已故的扎巴·阿旺嘉措和琶杰《格萨（斯）尔》杰出说唱家称号；授于才让旺堆、桑布拉·敖日布等22人《格萨（斯）尔》说唱家称号；还表彰了一批《格萨（斯）尔》演唱团体和艺人。

第五，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格萨尔》学枯木逢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40多年来，从调查、搜集、整理到翻版、出版、研究等等，一切都是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与关怀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全国到七个有关省、区，建立《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之后，各级有关领导亲自出任组长、副组长或成员，直接领导《格萨（斯）尔》工作，经常研究解决各种问题。各级政府每年都为《格萨（斯）尔》工作拨款，给予一定的经费。

为了指引《格萨（斯）尔》工作沿着正确方向深入开展，建国以来的数十年间，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已经发出110多份文件。这在民族文学领域是绝无仅有的。

1957年12月，中共青海省委发出《关于继承发扬本省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的指示》。遵照这个指示，青海省文联开始组织人力，调查搜集《格萨尔》。

1958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转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拟定的《〈中国歌

谣丛书》和《中国民间故事丛书》编选计划》的通知，指出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应认真付诸实施。这个计划明确要求青海省负责藏族《格萨尔王传》的搜集、整理、定稿和写序工作，内蒙古自治区负责蒙古族《格斯尔传》的搜集、整理、定稿和写序工作。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通知》精神，青海省文联立即组织专人在部分藏区进行了《格萨尔王传》的调查、搜集工作。一年之内搜集到34部木刻本和手抄本。中共青海省文联党组于1959年11月27日，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呈送了《关于藏族民间文学〈格萨尔王传〉的调查、搜集、翻译、整理情况的报告》。

1978年11月13日，中共青海省委作出关于为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平反的决定，并于11月30日，在西宁召开群众大会，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梁步庭同志到会讲话，公开宣布：“文化大革命”期间，以省委、省委宣传部、省革委会政治部名义所发所批的一切批判和否定《格萨尔》的通知、决定等文件，一律撤销；凡因积极领导和参与《格萨尔》的搜集、整理、翻译、编辑、写序、插图、出版、发行、改编、排演等工作而受到牵连和处分的同志，予以彻底平反，对为此而装入个人档案的材料一律抽出销毁，对因此而受的处分予以撤销。

1980年5月至1984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连续召开四次全国《格萨（斯）尔》工作会议，所产生的一系列文件，对于统一认识，统一目标，统一行动，把《格萨（斯）尔》工作步步引向深入，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1984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它要求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文化部门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指导，切实搞好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格萨尔》的抢救工作，具体帮助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对于《格萨尔》的学科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85年7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转发的《全国〈格萨尔〉工作总结、表彰及落实任务大会纪要》，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的纲领性文件。它不仅认真总结了“六五”期间的《格萨（斯）尔》工作，而且提出了“七五”期间《格萨（斯）尔》学科建设的方向与任务，使我国的《格萨（斯）尔》工作者受到巨大鼓舞，开创了《格萨（斯）尔》学研究的崭新局面。

1990年6月14日发出的《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在京成员扩大会议纪要》，是又一个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它在认真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格萨（斯）尔》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八五”期间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间里，《格萨（斯）尔》学科建设的近期和远期奋斗目标，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使大家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念，鼓足了干劲，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把《格萨（斯）尔》研究学推上一个新台阶。

1992年9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几十年来，第一次在最庄严、最权威的国家政府文告中，充分肯定了《格萨尔王传》的历史地位和抢救它取得的巨大成就。它写道：“《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创作的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一直作为口头说唱艺术流传在藏族民间。对这部史诗的抢救、整理和研究工作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并成立专门机构。现已录制了3000多盒磁带，整理出版藏文版62部，发行300多万册。”

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代表也十分关心和重视《格萨（斯）尔》工作。1988年以来，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和四次会议上，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部分代表三次提出了关于加强《格萨（斯）尔》抢救工作的议案。会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之作出了答复。

党和政府关心与重视《格萨(斯)尔》工作,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同志亲自挂帅,参与决策,排忧解难,创造条件。

毛泽东同志是重视民族民间文学的光辉典范,曾经十分关心少数民族民间艺人的成长。1950年2月,他接见了参加国庆观礼和演出的贵州少数民族歌手和艺人。1956年3月,他接见了参加全国先进文化工作者代表会议的蒙古族歌手毛依罕。1958年,他接见了出席全国民间作家座谈会的傣族歌手康朗甩等。1960年7月,他在接见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全体代表时,与蒙古族《格斯尔》说唱艺人琶杰亲切握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乌兰夫同志曾于1985年5月26日亲临全国《格萨尔》工作总结、表彰及落实任务大会,看望全体代表,并发表讲话:“这一史诗,不单是蒙藏人民历史文化的宝库,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发生着影响。做好这件事情,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同时也需要今后几代人花很大气力来完成。‘七五’做不完,‘八五’继续做好。总而言之,一定要完成好。这是蒙藏人民的希望,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希望。你们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所以,我对你们,对一切为继承和发扬人民的优秀文化传统而积极工作的人,表示慰问和祝贺!”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司马义·艾买提、布赫、杨静仁、胡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为《格萨(斯)尔》工作题过词。

原中国文联主席茅盾、周扬和副主席老舍生前都非常关心《格萨(斯)尔》工作。前面已经讲过了,早在1950年2月,老舍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作的《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介绍了藏族《格萨尔》和蒙古族《格斯尔》的基本情况,明确提出了藏族《格萨尔》,最初只有4部,后来发展到24部,并仍在民间流传的看法,从而引起了人们对这部史诗的重视。1961年4月10日,周扬同志《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格萨尔》要加快翻译、整理出来,粗一点也可以,快叫人看到。原始资料要印一套。不论是宗教、迷信、封建、色情、反动、落后,都要保存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更加关心《格萨尔》工作,多次发表讲话。1986年5月22日,他在病重住院期间,还给全国《格萨尔》工作总结、表彰及落实任务大会写去贺信,希望“尽快把这部伟大的史诗科学地整理出来,深入研究,贡献给全国、全世界人民。”

全国和七省区《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是由各级党政领导与专家学者组成的我国《格萨(斯)尔》学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十多年来,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进行了深入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北京的江平、聂大江、贾芝、王平凡、刘魁立、关鹤童、殷海山、陶阳、牟耕、降边嘉措、王克勤、杨恩洪、钟敬文等等;西藏自治区的热地、丹增、拉巴平措、次旺俊美、李朝群、土丹旺布、洛桑顿登等等;青海省的尹克升、田成平、桑结加、格桑多杰、程秀山、吴宝山、王贵如、左可国、王歌行、角巴东主等等;甘肃省的卢克俭、宋静存、邢树义、曲子贞、杨作林、杨应忠、郝苏民、王兴先等等;四川省的扎西泽仁、孙自强、杨岭多杰、肖崇素、周锡银、土登尼玛、更登等等;云南省的赵延光、李玉芳、李纘绪、徐国琼、李兆吉、王晓松等等;内蒙古自治区的赵志宏、苏尔塔拉图、刘云山、拉布坦、齐木道吉、漠南、格日勒扎布等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巴岱、买买提祖农·才仁加甫、董兆河、宋产明、巴德玛、布·阿木尔达来等等,都为我国的《格萨(斯)尔》学做出了宝贵贡献。

值得特别夸奖的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全国《格萨尔》翻译整理协调小组组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贾芝研究员和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

研究所所长、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会长王平凡同志。他俩是新的历史时期里,我国《格萨(斯)尔》工作最积极、最热忱、最受尊重的倡导者、领导者、支持者和开拓者,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建立了殊功!

我还要特别告诉大家:青海省党政领导同志一贯关心和支持《格萨尔》工作。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尹克升同志于1992年7月23日亲切接见了。他在听取汇报后高兴地说:“我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了有关《格萨尔学集成》出版发行的报道。这套书很好,有青海特色。青海是格萨尔的故乡,玉树、果洛等藏区,到处都在说唱《格萨尔》,搜集、整理、研究《格萨尔》,我一定支持你们把这套书继续编撰下去,为青海争光!”他还三次亲自解决编撰出版《格萨尔学集成》第四卷的经费问题。没有他的关怀与支持,该书就不可能问世。他的壮举使我深受感动,深受鼓舞!有这样重视《格萨尔》工作的省委书记作坚强后盾,我怎能不倍加努力,为民族奉献,为青海争光?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青海省省长田成平同志也是《格萨尔》工作的热情支持者。1993年2月,他欣然为本书题词:“编撰《格萨尔学集成》,为民族奉献,为青海增光!”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桑结加同志一贯非常重视全省的《格萨尔》工作。1990年9月12日,青海省召开首届《格萨尔》学术讨论会,他代表省委发表了《为夺取〈格萨尔〉研究的更大成绩而奋斗》的讲话,对青海的《格萨尔》工作提出了殷切希望。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青海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格桑多杰同志多年来为了发展《格萨尔》学,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经常为之奔走呼号,鸣锣开道,受到大家赞扬。

历史发展的轨迹证明:《格萨(斯)尔》的历史命运是与我们的党和国家的历史命运始终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新中国,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只有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才能登上艺术殿堂,大放异彩,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难怪德国波恩大学著名蒙古学家瓦尔特·海西希教授于1989年11月,在成都市召开的第一届《格萨(斯)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感叹道:“中国政府这么关心和重视一部史诗的搜集整理工作,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很少有的。我很羡慕你们。在我们国家,政府根本不可能这么做,要搜集民间文学,全靠学者自己奋斗。”

第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格萨(斯)尔》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史诗理论武装头脑,在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进行《格萨(斯)尔》学研究。其一,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运用它全面评价《格萨(斯)尔》,既充分肯定它在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又明确指出它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不搞全盘肯定,也不搞全盘否定。其二,坚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⑥。他们既是人类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它作为贯穿《格萨(斯)尔》学研究各个领域的一条基本红线。其三,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运用它分析研究《格萨(斯)尔》中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军事关系、战争问题等。其四,坚持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运用它考察《格萨(斯)尔》中每个人物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其五,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运用它认识藏族《格萨尔》与蒙古族《格斯尔》的关系,既承认后者来源于前者,又肯定后者不是前者的翻版,而是蒙古族人民再创作的独立作品。由于我们在《格萨(斯)尔》学研究中,坚持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反映论,因此能够对每个错综复杂的问

题，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得出符合史诗本来面目的科学结论。从而使我国的格学论著具有最大的历史真实性和科学性。

我认为，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的基本涵义应该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调查、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完整的《格萨（斯）尔》史诗版本，形成体系；拥有一支数量多、素质好、梯队结构的研究队伍；善于自觉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研究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种类繁多、论证深刻、结论科学、实事求是的学术论著；众多神奇的民间说唱艺人，还在继续创作、丰富、发展《格萨（斯）尔》，使之成为永葆艺术青春的活史诗。

现在世界上已有俄罗斯、布里亚特、阿塞拜疆、匈牙利、波兰、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丹麦、挪威、瑞典、奥地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澳大利亚、蒙古、日本、印度、不丹、尼泊尔、锡金、巴基斯坦、香港、台湾、澳门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在研究《格萨（斯）尔》，将其列为国际藏学、蒙古学的热门课题之一，发表了大量论著，为国际《格萨（斯）尔》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然而，外国的格学研究与中国格学研究反差很大，无法同日而语，相提并论。我们的优势，正是他们的劣势；我们的特点，正是他们的弱点：第一，缺少第一手历史文献和学术资料，谁也没有一套完整的《格萨（斯）尔》版本体系。不少人只是利用1776年俄国的帕拉斯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国外第一个1716年蒙文北京木刻版《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的俄文版本《在俄国奇异的地方旅行》、1836年德国的施密特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国外第一个蒙文北京木刻版《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的德文版本《神圣格斯尔的事迹》、1839年施密特的圣彼得堡出版的蒙文北京木刻版《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的德文新译本《功勋卓绝的圣者格斯尔王》和1883年俄国的帕塔宁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国外第一个藏文《格萨尔王传》的俄文版本《中国的唐古特—西藏地区蒙古西北散记》，以及以后数百年间陆续由中国传入世界各国的部分藏文《格萨尔》与俄文《格斯尔》的分部本和分章本等零星资料进行研究工作。第二，研究人员很少，分散于各国，没有正规的《格萨（斯）尔》学研究队伍。据估计，国外现有研究《格萨（斯）尔》的学者，大约100多人，有的国家只有3—5人，最多的也不超过20人，日本的《格萨尔》研究会，只有10多人。外国的研究人员当中，专职者少，兼职多。许多人是专门从事藏学、蒙古学、宗教学、人类文化学等研究的，只是把《格萨（斯）尔》列为其中的一个研究课题。第三，论著数量有限。200多年来，外国学者大约发表了360多篇（部）《格萨（斯）尔》学研究论著，相当于我国学者格学论著的三分之一左右。由于占有的资料太少，外国学者研究《格萨（斯）尔》的论著中，确有英国骆里莫的《格萨尔王传的罕萨口述版本》、法国大卫·尼尔的《岭超人格萨尔王传》和石泰安的《藏族格萨尔王传与演唱艺人研究》、俄国罗列赫的《岭·格萨尔王史诗》、蒙古人民共和国策·达木丁苏伦的《格萨尔王传的历史源流》、前苏联霍莫诺夫的《布里亚特英雄史诗格斯尔》、德国海西希的《多米尼克·施罗德和史诗〈格萨尔王传〉导论》等等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上乘之作，也有不少论证肤浅，无根无据，逻辑混乱，难以理解的下乘之品。有的文章甚至搞无米之炊，靠演绎推理法，东拉西扯，信口开河，令人读不下去。第四，没有说唱《格萨（斯）尔》的民间艺人队伍。目前除了在巴基斯坦的巴尔蒂斯坦和布里亚特境内有人会说唱当地流传的《格萨（斯）尔》章节外，其他研究《格萨（斯）尔》的国家和地区还未发现此类民间艺人。从而造成外国学者只能掌握某些历史的、书面的《格萨（斯）尔》研究资料，无法直接从说唱艺人那里获得最活、最

新,最丰富的营养,研究领域比中国学者狭小得多。第五,学术研究处于无政府状态。外国的格学研究不要各级政府的组织领导,也没有统一安排部署。一切按照个人的意志办事,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政府不干预。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格学研究无统一计划,无统一行动,无分工负责,有的课题有许多人研究,有的课题却从未有人问津,发展很不平衡。第六,世界观和方法论先天缺陷。外国学者研究学的角度与方法与中国学者截然不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运用形而上学与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格萨(斯)尔》。有些论著往往既有客观反映事物本质的正确方面,也有主观臆断、歪曲事物本来面目的错误方面。有的学者在论著中故意贬低或抹煞人民群众在《格萨(斯)尔》创作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宣扬唯心史观。有的学者研究了几十年《格萨(斯)尔》,却胡说《格萨尔》不是起源于中国的藏族,而是从外国传入的;格萨尔不是中国藏族的民族英雄,而是古代罗马的凯撒大帝或三国中的关羽。有的学者颠倒藏蒙《格萨(斯)尔》的渊源关系,说什么不是蒙古族《格斯尔》来源藏族《格萨尔》,而是藏族《格萨尔》来源于蒙古族《格斯尔》。如此等等的结论,都是形而上学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中国学者既不能同意,也不能接受。

让事实讲话,事实胜于雄辩。通过以上摆事实,讲道理和中外对比分析,我们不仅可以这样说,而且应当理直气壮地向国人和世界学坛宣告: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不能妄自尊大,吹嘘自己,本来没有“形成”,硬要吹牛说“形成”了;也不能妄自菲薄,本来已经“形成”了,硬要说没有“形成”,自己贬低自己。就姑且从现代算起,我国已有五代学者研究了60多年《格萨(斯)尔》,如果至今连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还未初步形成,那么国人就会质问:你们那么众多的专家学者60多年干啥去了?中国研究《格萨(斯)尔》,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格学科学体系,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中国格学,成就辉煌,独领风骚,举世公认!有些同志如果至今还不承认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已经初步形成,除了隔行如隔山,不了解情况,就是不尊重事实。不尊重事实,就不是唯物主义者!

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比起有待创造的东西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志在峰巅的攀登者,不应陶醉在沿途的某个脚印之中。我们虽然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斯)尔》学的科学体系,然而这仅仅是个良好的开端,登山的第一站,距离中国格学的成熟阶段、完善的境界,征程还很远,很远!何况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我们的格学研究尚有失误和差距:一是版本很多,尚未规范。藏文《格萨尔》与蒙文《格斯尔》的许多手抄本和木刻本还没有完全整理出版,还没有来得及做规范化工作,至今没有整理出版一套藏文《格萨尔》规范版本。蒙文《格斯尔》规范版本,藏译汉《格萨尔》规范版本,蒙译汉《格斯尔》规范版本。工程虽大,时间虽长,但必须完成,否则格学研究无法深入。二是,论著颇丰,尚需深入。从已发表的大量论著来看,多数具有较高学术水平。但是真正具有当代最高水平,受到国际关注的杰作还不多,史诗的一些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还有许多薄弱环节,需要我们在深度上下更大的功夫。三是领域广阔,方法老化。我国格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阔,课题越来越多,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很不适应迅猛发展的格学研究。研究人员只有熟练地运用电脑、录音、录像等现代化科研工具储存资料、整理文稿,传递信息,才能节省时间、人力和物力,提高工作效率,承担繁重任务,不断推出高新水平的研究成果。可是我国现有的格学研究者,绝大多数人仍习惯于采用早已老化了的传统方法从事研究工作,还没有学会运用

现代化科研手段，效率很低，远远落后于外国学者。四是艺人研究，还很薄弱。抢救众多民间艺人说唱的《格萨（斯）尔》部本，研究他们的说唱内容、形式、表演艺术等，是中国格学特有的一个大领域，我们已经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效显著。但是目前仍有许多薄弱环节。录制艺人说唱磁带，记录、整理、出版《格萨（斯）尔》说唱本的任务十分艰巨，进展缓慢。专门研究艺人的学者较少，论著有限，许多课题尚无人研究。五是资料分散，检索落后。最近十多年来，以全国与七省区《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为中心，狠抓了收集整理资料工作，初步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为格学研究创造了条件。现在的问题是各自为政、分散保存，至今没有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备、名符其实的全国《格萨（斯）尔》学资料中心。再加上全部采用落后的手工检索，因此利用率较低，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二

在此，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应当提出来讨论：世界上最早研究《格萨（斯）尔》的是中国，还是外国？

长期以来，一些外国学者一直瞧不起我们中国人，趾高气扬地把“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洋腔洋调唱到格学上来了，说什么“《格萨尔》在中国，《格萨尔》学在国外。最早研究《格萨尔》的是外国，不是中国。”在我国，有些人既不明白真相，又不亲自研究这个问题，一直轻信盲从此说，在自己的论著中也说外国研究《格萨（斯）尔》早于中国。

近几年来，我在编撰《格萨尔学集成》1—4卷过程中，翻阅了大量中外格学研究资料，发现外国学者这个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应当予以彻底推翻！

那些认为最早研究《格萨（斯）尔》的是外国，不是中国的先生们唯一的所谓根据就是：俄国的探险家帕拉斯于1771年将1716年蒙文北京木刻版《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从中国带到欧洲，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格萨（斯）尔》的学者。清代乾隆年间青海省互助县佑宁寺蒙古族松巴堪布·益希班觉尔（1704—1788）于1779年写出《关于格萨尔的答问》，是中国第一个、世界上第二个研究《格萨（斯）尔》的学者。

他们的这个所谓根据，违背历史事实，不值一驳。

《格萨尔王传》是将藏族历史人物格萨尔典型化、艺术化和神化的一部英雄史诗。它从11世纪诞生之后，在广泛传诵、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关注。在1776年之前的700多年时间里，大约有25种藏文等史书典籍中记载了许多身世不同的历史人物格萨尔的生平与活动：

11—12世纪流传的松赞干布的《国王遗训》中说：“北方乃是格萨尔军王，强力射箭立靶在四方，同时射中四靶者为王。”产生于同一时代的松赞干布的另一部著作《玛呢宝训》曰：“大唐皇帝的王子说：‘吐蕃杀了我们的弟兄，削弱了我们的军队，所以是我们的敌人，公主不能嫁往吐蕃。格萨尔军王英武善战，国家如遇危险，可请他来救援。所以应把公主嫁给格萨尔军王。’”

成书于1347年的《莲花生大师遗教》（《五部遗教》）记载：“在北方七星升起的天空之下，所谓仲地之内有格萨尔军王。”同一时期的《莲花生大师全传》也说：“萨贺尔（今孟加拉）王珠纳钵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儿叫孟达日娃。前去向她求婚的有印度王、象雄王、格萨尔王。”该书还说格萨尔王是莲花生大师的弟子，与《格萨尔王传》第一部《仙界遣使》里把格萨尔描写成莲花生大师的化身极为相似。

1388年成书的萨迦·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写道：“吐蕃大臣噶尔等人，为聘唐朝